

## 『水滸傳』中的僧道形象探析\*

吴学忠\*\*, 赵殷尚\*\*\*

### -차 례-

1. 緒論
2. 『水滸傳』中僧道形象概述
  - 2.1. 『水滸傳』僧道形象分析
  - 2.2. 山外傳統僧道形象分析
3. 『水滸傳』僧道形象的成因分析
  - 3.1. 元朝時期宗教政策的重要影響
  - 3.2. 元代雜劇僧道形象世俗娛樂化的影響
  - 3.3. 文學創作的內在需要
4. 結語

---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PaiChai University research grant in 2023.

\*\* 香港浸会大学 语文中心 高级讲师

\*\*\* 培材大学校 周时经教养大学 副教授(交信著者)

### [中文摘要]

本文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水浒传』中不同类型僧道人物。他们拥有非凡的技能，可以做到常人无法企及的事情。作者利用他们神秘而非凡的能力，营造出更加危险和离奇的情节和境地，同时呈现了他们离经叛道和坚守传统的形象，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此外，僧道人物的出现使『水浒传』中的角色更加多样丰富，扩大了作品的视野。与元杂剧不同，杂剧中的叛逆僧道多呈现负面形象，而『水浒传』中的梁山僧道在破坏规则的同时，仍能保持对忠义、节孝的坚守，并以实际行动实践这些积极的价值观。这为角色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和生活化的特点，更加真实立体。这种既正面又负面的形象打破了传统的善恶对立形象，使『水浒传』的情节更加丰富，更能吸引读者。

**关键词：**水浒传、僧道、形象、江湖、梁山泊、忠义、节孝

## 1. 緒論

『水浒传』在艺术上成果丰硕，其人物塑造范畴广泛，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都包含在内，就像一部社会人物的百科全书。在这部作品的六百多个人物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传统观念中应该遵守严格的宗教规范，如吃素修行、积善行为。然而，在施耐庵的笔下，这个群体中有许多人经常打破这些规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宗教人物的固有认知。这就是书中个性鲜明、身份独特但常被忽略的僧道群体。他们在『水浒传』中展现出独特的性格，并且僧道的特殊身份加上『水浒传』的江湖风范和反传统的英雄形象，在对立与统一中提升了艺术形象，创造出一群独树一帜的江湖人物形象。

『水浒传』中人物形象的相关研究分门别类，各具特色。其中对僧道人物个体分析的研究大多以梁山僧道群体中出场频率、知名度较高或者有显著特异技能的人物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较为精细的分析。其中最为典型的研究对象便是「花和尚」鲁智深，例如陈庆纪的「从鲁智深形象的塑造看『水浒传』的深层思想蕴涵」<sup>1)</sup>、侯会的「鲁智深形象源流考」<sup>2)</sup>和项裕荣的「密宗金刚、转世罗汉的佛教传说与鲁智深形象之生成」<sup>3)</sup>，都是对某一个特定人物展开的专题研究论述。再者诸如王学泰「『水浒传』江湖人物论(之三)面目不清的宗教代表公孙胜」<sup>4)</sup>以及淮茗「有始无终的神秘超人——说公孙胜」<sup>5)</sup>等研究文章，多是针对梁山的僧道人物进行个别人物形象研究。再者例如「神行太保」戴宗、「神机军师」朱武等人也有一些相关研究论文，而从宏观层面将作品中僧道人物以群体归类进行分析的研究尚未受关注。

另一方面，走出梁山泊，『水浒传』山下的社会里也存在相当一部分

1) 陈庆纪，「从鲁智深形象的塑造看『水浒传』的深层思想蕴涵」，《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2期，页65-70。

2) 侯会，「鲁智深形象源流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页17-22。

3) 项裕荣，「密宗金刚、转世罗汉的佛教传说与鲁智深形象之生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页131-136。

4) 王学泰，「『水浒传』江湖人物论(之三)面目不清的宗教代表公孙胜」，《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0期，页133-136。

5) 淮茗，「有始无终的神秘超人——说公孙胜」，《文史知识》，2012年第10期，页62-64。

僧道人物，他们在小说作品中的出现频率不高，能够占据大跨度篇幅的更是鲜有其人，但这并不能淡化他们形象的独特魅力，反而这个站在梁山人物另一面的僧道群体，与梁山僧道遥相呼应，彼此相互补充，共同结成了小说作品中的特殊群体，而目前学术界鲜有将山上与山下僧道人物统一归纳并进行研究。上文述及的研究现状对本文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若将『水浒传』中所有的僧道人物归纳分析，按照一定方法进行分类，并对其展开分析，从中总结出一些形象特征、形象成因、艺术手法等方面的思考，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切入点。因此，我们拟依此思路进行数据搜集，整理出以百回本『水浒传』<sup>6)</sup>为研究文本的僧道人物，对其身份形象、主要事迹和结局归宿进行归纳总结研究。此处值得说明的是选择百回本『水浒传』为研究底本，主要是考虑到百回本比被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在故事情节上更为全面有序，并且相比于包含打田虎、除王庆这些与全书风格不符、存在伪作疑问的百二十回本，百回本更为简练精炼。因此，百回本可以说是兼具两者优点的最佳选择。

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僧道身份的界定，我们也采用比较严格的标准。除了书中明确说明其僧人道士职业(或最终皈依)的宗教人物，例如「入云龙」公孙胜，一方面书中有类似「头绾两枚髻松双丫髻，身穿一领巴山短褐袍，腰系杂色采丝绦，背上松纹古铜剑。白肉脚衬着多耳麻鞋，绵囊手拿着鳖壳扇子。八字眉一双杏子眼，四方口一部落腮胡」<sup>7)</sup>的外貌描写，另一方面，「贫道复姓公孙，单讳一个胜字，道号一清先生。小道是蓟州人氏，自幼乡中好习枪棒，学成武艺多般，人但呼为公孙胜大郎。为因学得一家道术，亦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上都称贫道做『入云龙』。」<sup>8)</sup>这样正面描写也十分明确地点明人物职业身份。再者如人物名称中本来就有职业称谓的王道人、大圆和尚、智真长老人的身份也是一目了然。此外，判断人物身份的主要标准有二：其一是外形特征与穿着打扮，如「神机军师」朱武的外貌描写：「道服裁棕叶，云冠剪鹿皮。脸红双眼俊，面白细髯垂。智可张良比，才将范蠡欺。军中人

6)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2013年第32次印刷。

7)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十五回，页194。

8)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十五回，页195。

尽伏，朱武号神机。」<sup>9)</sup>，再如「宝光如来」邓元觉的外貌描写：

「穿一领烈火猩红直裰，系一条虎筋打就圆绦，挂一串七宝瓔珞数珠，着一双九环鹿皮僧鞋，衬里是香线金兽掩心，伏手使铮光浑鐵禅杖。」<sup>10)</sup>

上述描写文字清晰细致地展示人物宗教化的打扮装饰。其二则是行为举止与法术习惯，如习得道术、善八百里神行法、施法不开荤沾酒的「神行太保」戴宗，再如懂得奇门遁甲、旁门左道之术的包道乙，还有便是类似典型道教神话人物的九天玄女。除有明确身份称谓的人物外，本文谈及的僧道人物，一定要符合这两项标准方可入围，二者缺一不可。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精细地列出『水浒传』中的所有僧道人物，并获得准确的数据与文字信息。这样做，有助于我们对这些僧道形象进行归纳和分析，以便按照不同的特征和统一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透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推测作者在创作时的动机，并分析当时的宗教政策和社会特点，从而总结出『水浒传』中僧道形象的成因。这对于深化我们对『水浒传』的理解有一定的帮助，并期望能填补这个问题领域的研究缺口，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供他人参考。

## 2. 『水滸傳』中僧道形象概述

根据前文所述的人物检索方法，我们在百回本『水浒传』中统计出共有22位具有名字、称谓和具体事件的僧道人物，其中道教和佛教人物各占11位。从全书来看，大多数僧道人物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他们打破了既定的宗教行为规范，挑战了人们对传统僧道的固有观念，这一点可以从书中的一段经典文字中清楚看出：「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sup>11)</sup>可见他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便是

9)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五十九回，页786。

10)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九十五回，页1225。

离经叛道，不遵守法度。但书中二十余人的僧道群体绝非完全由这些僭越空门的混世魔王组成，同样还有诸如九天玄女、智真禅师这样的神女高僧在冥冥之中施经布道，如果说那跋扈嚣张的魔君闹得世间动乱，那么这些传统的僧道人物如同一张安全网，在山摇地动之时预防天翻地覆，他们保留最后一丝理性，辅助着全书故事线索得以顺势而行。『水浒传』中的一股强大力量，正是由这些违背传统规范与遵守规矩的僧道人物所构成的，他们也增加了故事中的宗教神秘感和复杂的矛盾冲突。

我们将僧道人物信息于下表列出，以便在论述时能够直接引用，也便于读者查阅，一目了然。

由下表可见，根据行为特征和人生经历，众多僧道可以泾渭分明地分为叛逆的非典型僧道和虔诚的传统僧道，而非典型僧道又可分为梁山僧道与山外僧道。据此，我们将『水浒传』中僧道分为三类：1.梁山好汉中的僧道人物、2.世俗化的恶僧恶道、3.山外传统僧道，逐一分类论述，归纳共同特性与个性，分析各异的人物形象。

#### 水浒传僧道人物一覽：

人物	身份形象	主要事迹	结局归宿
公孙胜 (道)	道号一清先生，学得道家法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主动参与策划劫取生辰纲，斗法高廉、巧破混天阵等。	辞别梁山好汉回二仙山修炼，侍奉老母。
朱武 (道)	精通阵法，善于用兵，广有谋略，常补吴用之缺失。	占据少华山打家劫舍，后率众归顺梁山，征讨方腊后辞官。	辞官后做了全真先生，云游江湖，后随公孙胜修道，以终天年。
武松 (僧)	鲁莽英勇，为避追捕化作头陀模样，始终以行者扮相起居征战。	景阳冈打虎，狮子楼锄奸。	杭州六和寺出家，至八十而终。被朝廷追封为清忠祖师。
鲁智深 (僧)	性格鲁莽豪爽，为人仗义，常以酒家自称，为避追捕在五台山出家为僧。不羁佛门清规，杀戒酒戒难循。	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火烧瓦罐寺、只身擒方腊。	宋军征方腊后，班师驻扎六和寺时闻潮信后安然坐化，被朝廷追封为忠武郎，加赠义烈昭暨禅师。
樊瑞	道士穿着，会妖术能呼风	在芒碭山上聚众打劫，	先与朱武做了全真先生，

11)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九十九回，页1284。

(道)	唤雨，人称混世魔王。	归顺梁山，随宋军剿灭方腊后辞官。	后投公孙胜出家，以终天年。
戴宗 (道)	有道术，善神行法。	为救宋江身陷囹圄，上山后主要负责打探军情、寻人和通风报讯等工作。	辞官到泰安岳庙出家为道，后大笑而终。
丘小乙 (道)	道士，绰号飞天夜叉	与生鐵佛崔道成作恶。	被史进杀死。
崔道成 (僧)	和尚，绰号生鐵佛	伙同飞天夜叉丘小乙占瓦罐寺为非作歹。	被鲁智深杀死。
王道人 (道)	会武艺，懂阴阳风水，自号飞天蜈蚣。	害死张太公一家老小霸占其女并盘踞山岭。	和武松交手后被杀死。
邓龙 (僧)	绰号金虎眼，本是僧人，后占二龙山为王。	拒绝前来投奔的鲁智深。	被鲁智深、杨志等人杀死。
裴如海 (僧)	蓟州报恩寺和尚。	与潘巧云私通。	被石秀杀死。
胡道人 (僧)	报恩寺后院的头陀，被裴如海利诱买通。	时常替裴海通风报信以便与潘巧云偷情。	被石秀杀死。
邓元觉 (僧)	助方腊谋反的歙州僧人，名号宝光如来，人称国师，官封元帅。	与鲁智深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	增援睦州时被花荣射死。
包道乙 (道)	参与方腊谋反，被尊为灵应天师，擅长以旁门左道的妖术害人。	用妖术砍下武松左臂，与樊瑞斗法。	被凌振用轰天炮炸死。
张真人 (道)	龙虎山成仙道士。	赴京为百姓消灾。	书中未载
智真禅师 (僧)	五台山文殊院住持长老，鲁智深的授业师父，被称为当世活佛。	知得过去未来之事，慧眼识得鲁智深身上有佛性，赠予其偈语。	书中未载
智清禅师 (僧)	东京大相国寺住持，智真长老的师弟。	接纳鲁智深，派其看守菜园。	书中未载
九天玄女 (道)	道教女神。	托梦救宋授天书。	书中未载
罗真人 (道)	公孙胜的师父，二仙山道士，法力高强。	传授公孙胜阵法、降服李逵。	书中未载
大圆和尚 (僧)	大名府龙华寺僧人。	途经梁山向宋江等人介绍北京风土人情。	书中未载
何玄通	勘验石碣文的道士。	为梁山做罗天大蘸。	书中未载

(道)			
大惠禪師 (僧)	杭州徑山寺主持。	为鲁智深超度。	书中未载

## 2.1. 『水滸傳』僧道形象分析

《水浒传》离经叛道的非典型僧道之中，既有樊瑞那样「好似北方真武，世间伏怪除妖」<sup>12)</sup>气势不凡的盗亦有道，也有崔道成这般「生的眉如漆刷，眼似黑墨，肱瘠的一身横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来。」<sup>13)</sup>令人一看便心生厌恶的穷凶极恶胖和尚。『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情节便告诉读者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均为天罡地煞魔星转世<sup>14)</sup>，因此梁山僧道不循法理的特性便顺理成章，与他们共同组成违法犯戒非典型僧道群体的便是那奸淫掳掠的邪僧恶道。与邪僧恶道相比，梁山僧道更倾向于对污俗世嬉笑怒骂、侧目而视的大巧不工，他们的命运显现出诡异而近似圆环的轨迹，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底线有一种自觉的坚守和敬畏。

### 2.1.1. 梁山好漢中的僧道人物形象分析

#### (一) 崇勇尚武敬重忠义 大开杀戒不忌酒肉

梁山好汉所走的路是前人未曾踏足的，他们反对奸臣和无能的官府，强调家国和兄弟忠义。梁山僧道以反对派形象出场，在气场特征和价值取向向上都与官场世浊中的迂腐温吞和不作为的现象格格不入，彼此之间势不两立。他们身为江湖人物，都展现出叛逆不羁的性格，从外貌到内在都让人望而却步，最为典型的正是山上两大武僧——「戒刀灿三尺春冰，深藏鞘内；禅杖挥一条玉蟒，横在肩头。鹭鸶腿紧系脚絛，蜘蛛肚牢拴衣钵。嘴缝边攒千条断头鐵线，胸脯上露一带盖胆寒毛。生成食肉餐鱼脸，不是看经念佛人。」<sup>15)</sup>的「花和尚」鲁智深与「前面发掩映齐

12)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六十回，页790。

13)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六回，页89。

14)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一回，页5。

眉，后面发参差际颈。皂直裰好似乌云遮体，杂色绦如同花蟒缠身。额上戒箍儿灿烂，依稀火眼金睛；身间布衲袄斑斓，彷彿铜筋铁骨。戒刀两口，擎来杀气横秋；顶骨百颗，念处悲风满路。神通广大，远过回生起死佛图澄；相貌威严，好似伏虎降龙卢六祖。直饶揭帝也归心，便是金刚须拱手。」<sup>15)</sup>的「行者」武松。

首先，从装备来看二者皆是披坚执锐、寒兵利刃不离左右。本是带有禅意的佛门日常生活用具，戒刀禅杖在他们手中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矛利刃。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痴迷争斗的形象特性异于常规。烂银般的劈星戒刀，玉蟒似的水磨禅杖，武器的精细描写令人印象深刻，并且让这两样兵器根深蒂固地成为人物的一大特征，甚至可令读者看到戒刀禅杖，便可想起武松和鲁智深二人，透过将他们勇武争斗的个性特征深植于读者脑海，与传统观念中慈悲为怀的佛门僧侣相比，突出了二僧在气质和习惯方面的巨大反差，有助于强化人物形象特征。其次，书中对梁山僧道外形的描写也很传神。作者以多种修辞手法令其内里的凶、悍、莽、戾的性格一览无余，完全颠覆了佛门中人慈眉善目的固有形象。相比之下，梁山道门人物形象则平和一些，多带有道家风骨，但外貌言语仍然无法掩盖其内在的叛逆和反抗精神，此说可从从梁山道士行迹说开去。例如闲云野鹤的公孙胜，身为出家人竟然自发谋划打劫生辰纲，纵使此物乃官府赃物，对于本来应该身处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道士而言也是不义之财，一清道人公孙胜竟主动投靠晁盖密谋截取生辰纲，并在过程中担任了主谋，还利用法术公然拒捕，后随晁盖割据一方。如此想来此举实为大忌，恰如吴用调侃公孙胜之言「明有王法，暗有神灵，你如何商量这等的勾当？」<sup>16)</sup>再者似儒雅多谋的朱武，仙风道骨的樊瑞，都是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山贼头领，便不必说凶悍莽撞、身负命案化作僧侣的鲁智深和武松二人了。总体而言，梁山僧道并非守法良民，人手均有命案，不愧有魔君之实。

此外，梁山僧道也无法摆脱对酒的诱惑，聚义分金、大口吃、大碗喝酒乃是例行日常，佛家偈语，道家箴言，早已抛诸脑后。综上所述，梁

15)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五回，页74。

16)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三十一回，页408至409。

17)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十五回，页195。

山僧道具有大开杀戒、酒戒难循，崇武尚勇的叛逆性格，但又常存忠义之心的总体形象跃然于纸上。

## (二) 坐化空门得以善终

『水浒传』结局之悲壮令人无限唏嘘，南征北战后山上头领所剩无几，其中身染恶疾而歿、还遭奸臣迫害者又折大半，而上文所列的梁山僧道皆是寿终正寝。据书中所载，鲁智深听潮坐化，被李卓吾、金圣叹等人评为真佛；武松则是虔心遁入佛门，在六和寺修道至八十圆寂；公孙胜携朱武樊瑞修道，以终天年；戴宗在泰安为道，大笑而终。纵观梁山僧道六人最终得以保全，少斧钺之危，无奸佞之逼迫。他们褪去莽撞戾气，回归各自身份所属的领域，其中武松与鲁智深皆获朝廷封授。六人一起返璞归真看似巧合，又像是『水浒传』作者有意为之。历经生死洗礼，梁山僧道似乎顿悟，纷纷找到了自身的终极价值与归宿，冥冥之中偶得雪山半偈，参透命理玄机。这种在开篇以僧道身份为读者熟知却不行僧道之实，临近尾声大彻大悟得道入定的圆环式命运轨迹，我们将之理解为追寻自我认知的过程，也恰恰符合了鲁智深坐化式的那句「今日方知我是我」<sup>18)</sup>的宗教审美心理。梁山僧道最终的结局归宿也就体现了宗教与世俗的分化，修正成果之日正是他们实现真实的自我认知之时。

### 2.1.2. 世俗化的惡僧惡道形象分析

梁山僧道虽不受戒律所束，但始终秉持「侠义」二字，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僧道行为，但不失侠义气概，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他们与违反江湖规矩、破坏忠义精神的行为势不两立。而山外邪恶僧道却与之大相径庭，形象可恶、言行可憎形容这个群体最恰如其分，也自然成为梁山僧道的极端对立面。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正襟危坐于庙堂之间，衣冠楚楚立于众人面前，在私下做的却是作奸犯科的勾当，为江湖义士所不齿，屡屡挑战忠义精神的底线：首先，他们贪图钱财，为此烧杀抢掠无

18)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九十九回，页1284。

所不用其极。较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以蜈蚣谋害人命的王道人，蓟州被金钱买通、为裴如海与潘巧云偷情通风报信的胡道人，这些人均是利欲熏心不守清规的代表。其次是好色淫邪，此乃江湖大忌。悉数排查一下，共八人的邪僧恶道群体有五人便是犯了和淫邪色禁相关的戒律，这些人通常在包天色胆驱动下为非作歹。例如「飞天夜叉」丘小乙，言语行径显然便是一个淫道形象：「你在东时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我无妻时犹闲可，你无夫时好孤恁？」<sup>19)</sup>这般轻佻淫秽之语出自凡人之心尚觉低俗，何况是道人。更加著名的便是淫僧裴如海，『水浒传』作者在书中对其淫邪气质的描绘入木三分：

一个青旋旋光头新剃，把麝香松子匀搽……那和尚光溜溜一双贼眼，只睽趁施主娇娘；这秃驴美甘甘满口甜言，专说诱丧家少妇。淫情发处，草庵中去觅尼姑；色胆动时，方丈内来寻行者。仰观神女思同寝，每见嫦娥要讲欢。<sup>20)</sup>

这段文字简明生动，人物形象活泼，言语奸诈狡猾，行为齷齪淫乱，短短几句便将此人「色中饿鬼」的本质揭露无遗。从作者的着力塑造程度而言，着实能感到其对此等淫僧的不齿与唾弃。而裴如海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也使其几乎成为了淫僧的代名词，利用潘巧云言语的侧面描写，更是将其淫邪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梁山僧道不犯色戒的形象特征形成鲜明对比。邪僧恶道另一处显著特征便是欺凌良善，试图独占二龙山的邓如龙如此，助方腊造反，企图颠覆正统政权的邓元觉、包道乙更是如此，空门之人竟参朝理政，贪图功利，于清规不符，叛乱造反，更是违背传统道德，这显然与笃信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相对立。梁山众人虽割据一方，不守法纪，但与方腊造反集团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与梁山僧道具有统一结局归宿相对应，山外邪僧恶道的下场也同样具有对应的相似性质。他们大多是争勇斗狠之辈，自恃有欺凌一方的手段，遇到对立阵营，必然兵戎相见，与梁山人士发生正面冲突在所难免。出场的共计八名山外邪僧恶道，皆为梁山人物所杀，这种对应相克关系，也可以视为「替天行道」在情节中的物具体表现。

19)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六回，页89。

20) (明)施耐庵、罗贯中 著，『水浒传』，第四十五回，页598。

## 2.2. 山外傳統僧道形象分析

### 2.2.1 洞悉世事孤居淨土

在『水滸傳』中，離經叛道的僧道以強烈的存在感吸引着讀者的目光，然而我們也不應忽視那些守着傳統僧道身份的群體。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和奔走，一些人可能難以抵抗內心的魔鬼而造成大禍。這些傳統僧道共同特征之一是在堅守空門本性的同時，全力施經布道，感化他人。與那些破壞戒律的梁山魔君和俗世惡靈相比，他們守護着這片最後的淨土，用內心的寧靜對抗外界的喧囂。此外，他們大多洞悉世事，能夠體察整體局勢。書中的這些僧道在許多場合都展現出超越常人的鎮定從容。例如，魯智深的恩師五台山文殊院主持智真長老，一開始並未透露他是活佛，只被認為是院主持。面對魯智深喝酒撒野，智真長老厲聲喝止「智深不得無禮」，魯智深立即清醒，停止暴力行為，恭敬向前。更重要的是，智真長老是第一個發現魯智深內心佛性的人，當眾質問並譴責魯智深的暴行，以此強行服眾。直到後面的內容，讀者才恍然大悟，這個伏筆與全書第九十回介紹的活佛身份相呼應。這個例子清楚展示了智真長老的睿智和讓魔君心服的威望。同樣的例子還有大圓和尚和道士何玄通，他們在綠林人士占山為王的情況下，沒有明顯的胆怯和回避，能夠與百余魔君談笑風生，表現非凡。總的來說，這些傳統的僧道擁有超越常人的大局觀和前瞻意識，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能守護著書中罕見的一片內心淨土，不被世俗洪流所淹沒。

### 2.2.2. 苦心竭慮盡所能助梁山

在『水滸傳』中，空門潛心修道者常常展現出非凡的眼力、胆識和造化修為，這些特點被巧妙地融入到書中的章節中，為梁山好漢排忧解难，推動情節的順利發展。從開篇下山降福的張天師，到引路、授書、救險的九天玄女，再到獻計傳藝的羅真人，這些傳統僧道都利用法術技能拯救民眾於水火之中，同時展現出他們良善的內心。

此外，例如何玄奘将蝌蚪文翻译为天降石碣，排定山上座次；行僧大元和尚介绍大名府风土引出卢俊义，点醒宋江；大惠禅师为坐化的鲁智深祈福竹土木戈等，这些僧道人物虽然在书中出场不多，甚至鲜为人知，却为梁山好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梁山好汉是替天行道，那么这些传统的能僧巧道就是奉天传谕，用他们的技艺帮助那些秉承天道、重整浊世的魔君。他们在故事中扮演了传帮带的润滑角色，使情节更加顺畅。

综上所述，叛逆僧道在书中异常夺目，可视为情节发展的主导者之一，而传统僧道在保持了固有原则的同时也成功地完成了配角的任务，让整部作品和谐有序。

### 3. 『水浒传』僧道形象的成因分析

『水浒传』中出现了离经叛道僧道和安分守本僧道形象，我们可以从作家与作品两个角度入手，分析创作时频繁出现僧道形象的一些原因。根据施耐庵的生平经历来看<sup>21)</sup>，他主要生活在元末明初，他曾中状元及第，任职钱塘令，后因得罪权贵，弃官回乡开始潜心著述创作。施耐庵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元朝统治时期，『水浒传』正是在该阶段成书，书中异于传统的僧道形象的形成，可从当时的社会情况分析，从而找出影响创作的重要因素。

#### 3.1. 元朝时期宗教政策的重要影响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的统一政权，幅员辽阔，横跨欧亚两界，形成了内部短暂稳定的大一统局面，国土所涉

21)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前言指出：施耐庵(约1296-约1370)，关于其生平数据的历史记载非常少，学者们对其生平并没有明确的定论。从明人王道生所写的「施耐庵墓志」和发现的『施氏家簿谱』可知施耐庵自幼博学多通，才华横溢，无所不通。因不屑阿附权贵，弃官归里，安心著书。据说曾任张士诚幕僚，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也曾多次召他入京为官，然他坚辞不就。(施耐庵，『水浒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页1。)

之地包含民族成分多样复杂。如此局面，也促进了大量的人口迁徙，中原周边地区各族民众大量涌入中国，元朝具有歧视色彩的民族政策也迫使一些汉人远走边疆，进入少数民族区域，如此一来便使彼时元朝形成了民族成分复杂，各族杂居交错的状态。民族大迁徙的同时也使多种宗教在全国各地的广泛传播，宗教在全国的普及区域比例显著提升，再加上蒙元统治者本就具有本族原始宗教信仰，因此元朝的宗教政策呈现出一种新的状态。

### 3.1.1. 僧地地位提升

蒙古初入中原时，为了维持统治并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汉人的反抗情绪，他们决定放弃萨满教，因其规模和影响力已无法适应当时的蒙元政权。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本土的宗教，如道教和佛教，在劝人安分守己、修身养性以及稳定社会和辅助政治教化方面具有重要功能。在道教领袖丘处机等人的呼吁下，元朝政府开始重视佛教和道教的作用，并提高宗教人士的社会地位。这一点从宗教领袖受到的待遇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称丘处机为「神仙」，封号「长春真人」，并赋予他「掌管天下出家人」的权力。元朝统治者自上而下信奉佛教，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尊称八思巴为「帝师」，统领天下佛教和吐蕃政教事务。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宗教领袖受到尊崇，他们的地位大幅提升，宗教规模迅速发展。宗教人士的地位甚至与达官显贵不相上下，社会等级中出现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的排行。总的来说，佛教和道教在元代的地位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僧道群体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深远，被视为仅次于官吏的高贵群体。佛教和道教人士的存在感达到了无可取代的程度，这也在文学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水浒传』的成书时期，这一群体被纳入情节中，成为一个特殊而庞大的角色群体。

### 3.1.2. 僧道經濟活動

元朝政府提升宗教地位的同时予以佛道人物方面极大资助，历代王朝

寺庙道观皆有一定维持生计的自耕地，到元朝时期，赏赐加倍，耕地扩充，许多良田甚至要为扩建寺庙让路，僧人道士的物质生产资料和财富达到了空前的丰富，社会财富大量聚集在宗教界人士手中。另外，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道士僧侣就可以免除赋税徭役<sup>22)</sup>，他们无生计之忧，无皇粮之负，还有稳定丰厚政策赏赐收入。于是，坐拥大量财富的僧道开始渴望消费，将金钱转化为物质享受数据，追求更深层次的享受，苦行僧式的生活理念不再，因此出现僧侣追求享受、迷恋消费的现象。僧道在追求享的过程中发觉了物质财富的好处，对金钱的渴望已达到了畸形的程度，更是不择手段地疯狂敛财，甚至出现了僧人盗墓敛财<sup>23)</sup>这样骇人听闻的奇闻，因此也有人对当时的僧道发出了这样的评论：「视外物重于身，愈有而愈为。」<sup>24)</sup>于是，当僧道群体贪恋物欲享受之时，宗教界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僧道免徭役无税，本就没有生活负担，更有优越的条件保证，便有相当一部分流民以及为躲避徭役的闲汉投机式地加入宗教，僧道人数陡然攀升。群体的非正常扩充带来的是教徒质量下降，并且相当一部分僧道入职时便动机不纯，破坏戒律僧道的比例大幅度升高成为了必然恶果。

各类教派迅速发展壮大，宗教人士更是登堂入室，以至于过度的宽松的政策逐渐走向极端化，当出家人自身失去了内心自觉，外在又缺少制度的约束，心魔迭出便使祸患丛生。首先是法律方面，僧地地位极度显赫，甚至越居法律之上，还对违法教徒包庇纵容。法律也极度缺乏公平公正，对待普通百姓和僧人道士完全是双重标准，如此标准一方面使得民怨四起，另一方面更助长了宗教人士的歪风邪气。以元朝佛教为例，帝师和一些高级僧侣有权干涉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僧俗案件的审判，他们也常在重大宗教活动举办之际，借佛教之名要求释放一些重刑犯，并称之为「秃鲁麻」，这些重刑犯是那些非富即贵的豪强官吏。<sup>25)</sup>正如『元史』中世祖朝名臣不忽木在与忽必烈对话中犀利指出：

22) 周爽，「浅析蒙元的宗教政策」，『黑龙江史志』，2010年9月，页13。

23) 周爽，「浅析蒙元的宗教政策」，页13。

24) 杨宁，「元杂剧中僧道形象世俗化原因探析」，『天中学刊』，2009年4月，页84。

25) 周爽，「浅析蒙元的宗教政策」，『黑龙江史志』，2010年9月，页14。

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强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sup>26)</sup>

僧人与贵族阶级相勾结，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公正权威，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也受到严重冲击，宗教人士作奸犯科、不守法纪的印象色彩逐渐浓厚，『水浒传』中杀人纵火、掳掠邪的僧道，即可视为当时社会僧道亵渎法律的缩影。

其次是政治权利方面，史书中记载的元代僧道为官的例子不胜枚举：「西番僧教瓦班为翰林承旨」<sup>27)</sup>：「宁夏立河渠司，秩五品，官二员，参以二僧为之」<sup>28)</sup>；「胡僧小住持者，服三品命」<sup>29)</sup>。同时僧道还通过自己的人脉举荐官员，僧人子聪便是彼时禅宗领袖海云推荐的人选。宗教人士踊跃为官，权力欲望逐渐膨胀，作为也日益嚣张，类似上文干预司法公正的事件频发，仁宗时御史台臣就曾进言：「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释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宪，辄营求内旨以免罪」<sup>30)</sup>回想『水浒传』中如邓元觉、包道乙等人参国理政、热衷仕途的形象在这方面恰能对应吻合。

最后是经济方面宗教界的横征暴敛。元朝统治者曾下令免除僧道赋税徭役，政策保护令寺庙经济发达，同时在浓厚的崇经重道的气氛中，占用田地建立寺庙院观时有发生，许多农民破产沦为僧道或投靠寺院寺户和佃户<sup>31)</sup>，于是寺院日益富庶，国家财政却因此受到冲击：大量有生劳动力寄生于寺庙之中，税收徭役来源减少，同时政府还要增加对于寺院的拨款资助，僧道人数愈众，财政负担愈重，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26) 『元史』第十册，卷一三零「不忽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一版，页3171。

27) 门焜，「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殷都学刊』，2001年1月，页64。

28) 门焜，「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页64。

29) 门焜，「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页64。

30) 『元史』第二册，卷廿四仁宗本纪，页556。

31) 周爽，「浅析蒙元的宗教政策」，『黑龙江史志』。2021年9月，页13。

### 3.1.3. 受到元代暴戾世風浸染造成的形象异化

蒙古统治者自漠北草原掳掠中原，也践踏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纲常，同时将蒙古草原上带来的习惯建立于中原，形成了独具游牧民族气息的规章制度。

从宏观社会来看，首先，在当时的情况下，异族统治者带着他们意识形态政权入主华夏，怀有「非我族类」眼光的汉族民众本身对其有抵触情绪，再加上亡国之恨，灭族之仇，双重矛盾作用带来的仇视心理和不平之愤让整个汉人社会不安宁。其次，元代盛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彼时元朝社会严格划分社会阶层等级，并实行严酷苛刻的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统治者强行将社会成员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身处社会底层的汉族民众长期以来遭受着地位不平等和法律的不公平，人格尊严尚且不说，甚至是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最为典型的就是蒙古人屠戮汉人无责，而汉人反击蒙古人有罪，这令汉人人心怀不满和无奈的同时也产生了对社会畸形制度的憎恶情绪。再次，元朝蒙古贵族还将蒙古草原上残暴的奴隶制社会的习气带到了治国理政当中，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君臣关系主奴化<sup>32)</sup>，经自古演变发展后相对和谐的君臣关系在忽必烈蒙元贵族的行为影响下变成了主奴关系：

从草原带来的主奴从属心理习惯被代入整个官僚系统，朝廷内外大臣统统被当作黄金家族的奴仆，君主掌握着对大臣的生杀大权。捶击大臣情况不胜枚举。<sup>33)</sup>

朝堂之上大臣被打乃是屡见不鲜，手段也非常残忍。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九月，忽必烈诏谕：「今后所荐，朕自择之。凡有官不勤于职者，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sup>34)</sup>由此可见，臣子不论官职身份，稍有疏忽便遭斩杀。相较于前朝赵宋刑不上大夫的宽容姿态，

32) 常斯维，「论元代社会对元杂剧悲剧创作的影响」，《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0年1月，页43。

33) 胡淑芬，「元杂剧情节模式与元代社会」，《艺术百家》，2000年4月，页28。

34) 胡淑芬，「元杂剧情节模式与元代社会」，页28。

元朝统治者给予臣子、百姓具毁灭性的心灵冲击，加剧他们内心的幻灭感。最后，马背上得天下的元朝统治者极度崇尚武力解决问题，使整个元朝社会重武轻文，文人士大夫严重遭受轻视，武力成为许多人事的首选。正是这样一种压迫严重，民族矛盾尖锐混乱状态，伴以自上而下言行举止当中释放出的暴虐气息，文人心理苦闷彷徨，在惶恐中创作的文学作品带有类似的风格便很容易理解。『水浒传』中的僧道人物，大多数都是兵器随身的武装僧道，如果连空门之人尚都无法避免暴戾侵蚀下的异化，那么俗世之人的暴戾凶残可能更甚。乱世之中，『水浒传』大量僧道所展现的离经叛道行为，既是当时社会形态人物异化的写照，更是将元代暴戾世风对社会各阶层无孔不入浸染的怒斥和鞭笞。

### 3.2. 元代雜劇僧道形象世俗娛樂化的影響

离经叛道的僧道形象并非『水浒传』首创，但『水浒传』一书生动的表现力与巨大的影响力却使之脱颖而出，除却宗教政策对『水浒传』僧道形象产生影响之外，元代文学作品的借鉴之用也是一大重要因素，其中又以元朝时期最具代表、故事性和戏剧性极强的元杂剧为翘楚。作为文学戏剧世俗化、市民化的产物，元杂剧中描绘僧道，具有与『水浒传』部分僧道离经叛道特性一脉相承的世俗化倾向特征。元杂剧中僧道世俗化，是宗教人物趋向于感性、实现与功利的真实感，他们不再是与现实生活相差万里的理想化人物，而是言行举止贴近世俗生活的僧道，他们原本代表着宗教的庄严神圣与不可亵渎，但在世俗化过程中神圣形象渐遭蚕食，故其与翩然尘外渐行渐远、开始出现世俗化的情欲甚至陋习与人性的弱点，也就逐渐融入世俗化生活当中。例如杂剧『昊天塔』一僧人自述：

我做和尚无尘垢，一生不会念经咒。听的看经便头疼，常在山下吃狗肉。<sup>35)</sup>

在『鸳鸯被』中，小道姑也说出「不由我也不动心。我如今等不得师父

35) 『昊天塔』第三折第133段，见『全元曲』(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址：<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46384&remap=gb>

回来，自做个主意，只在庵前庵后寻一个精壮男子汉去来」<sup>36)</sup>这般令人汗颜的话语。

在元杂剧中，酒色财气等宗教中人的禁忌被完全忽略，这种混乱的场景既受到元朝特殊的教育政策影响，也与杂剧的娱乐性目的有关。从古代祭祀演出演变为当时的戏曲艺术，歌舞艺术从供奉神明转向供人娱乐，戏曲的观众是人类，因此需要改变内容和表演目的以适应人们对精神和文化需求的认知。因此，杂剧在民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其突出的娱乐性息息相关。此外，戏曲艺术以其卓越的表现力，将原本神圣的僧道形象拉下神坛，利用滑稽的艺术手法创造了强烈的反差效果，使其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满足了大众的娱乐和消遣需求，将僧道塑造成世俗的文学形象，可以说是娱乐的产物。同样，作为在市民娱乐休闲环境下出现的小说，『水浒传』也具备了元杂剧的娱乐性质。因此，可以说『水浒传』中的僧道形象继承了元杂剧核心的娱乐精神，作家们根据观众的喜好，创作出这些形象，以表达对宗教世俗化的理解和对虚伪道貌岸然者的戏谑和嘲弄。

### 3.3. 文學創作的內在需要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其人物的经历和技能充满传奇色彩。其中，僧道人物拥有特殊的身份背景和宗教神话体系，为故事增添了神秘的色彩。由于僧道人物具有非凡的技艺，超越了常人的能力，作者可以利用他们的神秘无比的能力来设置更加危险离奇的情节和处境。读者对于与众不同的僧道人物充满期待，而他们又同时违背传统与守护传统价值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增加了情节的吸引力和话题性。因此，故事的冲突更加激烈，引人入胜，让人着迷。

从整体社会结构组成方式来看，『水浒传』包含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不同身份的人物代表着不同的个性特征和处世理念。例如，小吏出身的宋江图谋终有一日封官进爵、福荫子孙；小贩出身的李小忠眼界短浅，吝啬小气；而代表武僧形象的鲁智深尽管喝酒吃肉、杀人放火，

36) 『鸳鸯被』第二折第87段，见『全元曲』(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址：<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15062>

但他的出发点和言行举止还是或多或少受到佛门习惯的影响。这些不同职业阶层的人物形象组合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对应到元朝流行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的社会阶级分层。加入僧道形象后，整本书的人物构成更加多元丰富，拓宽了写作视野，也符合当时读者的常识习惯。

同时，梁山僧道的出彩表现也值得人们关注。尽管他们破怀固有规则秩序，杀人放火时的凶悍令人畏惧，但他们的形象透露出亦正亦邪的独特气质，令人所赏甚至着迷。梁山僧道与贪官浊世及压抑个性的清规戒律为敌，让读者隐约间感受到与传统安分的文学体验不同的区别。这种笔调类似于作传奇之笔法，改动甚至颠覆了固有观念，形成猎奇感，引人入胜。『水浒传』作品中对僧道形象的颠覆与上文所提及的元杂剧不同，杂剧中的叛逆僧道多以负面形象呈现，缺乏美感。然而，『水浒传』中的梁山僧道在破坏规则的同时仍能保持对忠义节孝的恪守，并以实际行动实践这种为世人所称道的积极理念。相较于以往的英雄人物，他们存在些许令人能够接受的缺点，反而增添了更多人性与生活化色彩，更加有血有肉，对读者而言是更为立体真实的人物。他们的离经叛道是在维护那不被世俗理解的正义，无论是僧道还是魔君，这种亦正亦邪的形象使人物变得复杂立体，打破了一种至善至恶的陈规，人们无法绝对地断言他们到底属于哪个极端，他们成为了徘徊在黑与白边界灰色地带的人物形象。如此一来，也使得全书的情节内容丰富，增加了不同的解读角度。

『水浒传』是在乱世中成书的，官府无能，社会风气堕落，普通人民生活困苦之中。小说中描写了离经叛道的僧道和坚守传统的僧道，展现了人们行为和心态的混乱，反映了社会的混乱和宋代末年的动荡。离经叛道的种种现象正是乱世中人心散乱、社会风气日益恶化的体现，既有对人心不古的无奈，也有对现实局势的失望。而传统僧道的形象则象征着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坚守，他们是道德良知的支柱，使得正气不会倒塌。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呼吁世人，试图唤醒那浩然正气，也代表了作者内心对正气和清风的强烈呼唤。

#### 4. 結語

本文从宏观层面将『水浒传』作品中僧道人物以群体归类进行分析。大致来说,『水浒传』僧道人物身怀绝技,可以达到常人所不能,『水浒传』作者利用僧道神秘绝伦的技艺设置更为险恶离奇的处境和情节,再加上他们离经叛道与恪守传统的形象对立,丰富了小说故事情节。

另外,僧道人物的出现使『水浒传』故事人物构成更加多元丰富,拓宽了写作视野,『水浒传』对僧道形象的颠覆不同于元杂剧。杂剧当中的叛逆僧道多以负面形象呈现,而『水浒传』中的梁山僧道正在破坏规则的同时还能保持对忠义节孝的恪守,并且以实际行动践行此类为世人所称道的积极理念,增添了更多人性与生活化色彩,更具人间烟火,对于读者而言是更为立体真实的人物。这种亦正亦邪的形象,打破了传统至善至恶的陈规俗套,塑造了一群徘徊在黑与白边界灰色地带的人物形象。如此一来也使『水浒传』全书的情节内容更为丰富,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水浒传』。

[Abstract]

## An Analysis of the Portrayal of Monks and Taoists in The *Water Margin*

Hok Chung Ng(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Eunsang Cho(Pai Cha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onk and Taoist characters in "*Water Margin*"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se characters possess extraordinary skills and can do things that ordinary people cannot. The author uses their mysterious and extraordinary abilities to create more dangerous and bizarre plots and situations, while presenting their departure from tradition and adherence to tradition, enriching the novel's storylines. In addition, the appearance of monk and Taoist characters in "*Water Margin*" makes the characters more diverse and expands the scope of the work. Unlike Yuan Zaju, where rebellious monk and Taoist characters often have negative portrayals, the monk and Taoist characters in "*Water Margin*" can maintain loyalty, filial piety, and positive values while breaking the rules, and they practice these values through practical actions. This gives the characters more humanity and lifelike characteristics, making them more realistic and dimensional. This combin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ages breaks the traditional dichotomy of good and evil, making the plot of "*Water Margin*" more rich and appealing to readers.

**Key words** : *Water Margin*, monk, Taoist, image, jianghu, Liangshan Marsh, loyalty, filial piety

## [参考文献]

### ■基本資料

(明)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2013年第32次印刷。

(明)施耐庵,『水浒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

### ■單行本`

桂晓元,『四大名著人物神怪通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沙先贵,『水浒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

王学泰,『水浒与江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李真瑜,『水浒传说』,北京:京华出版社,2004年。

### ■論文 및 其他 資料

马彩霞,「元代僧人世俗化探析」,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下载至『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门岩,「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殷都学部』,2001年1月,页63-66。

常斯维,「论元代社会对元杂剧悲剧创作的影响」,『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0年1月,页43-44。

杨宁,「元杂剧中僧道形象世俗化原因探析」,『天中学刊』,2009年4月,页84-86。

王晓欣,「说「九儒十丐」和儒士儒学在元代的地位」,『历史教学(中学版)』,2010年6月,页7-9。

项裕荣,「试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淫僧形象——以明代话本小说为讨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4月,页50-62。

胡淑芳,「元杂剧情节模式与元代社会」,『艺术百家』,2000年4月,页27-30。

周爽,「浅析蒙元的宗教政策」,『黑龙江史志』,2021年9月,页13-14。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46384&remap=gb>, 檢索日 2023年 5月 1日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15062>, 檢索日 2023年 5月 1日